

粮食安全始终是头等大事

——读习近平总书记《确保我国粮食安全》

□ 胡天娇

习近平著作选读

重读经典



《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是2013年1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收录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这篇重要文献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阐释了始终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重要性，提出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我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引和行动指南。

深刻指出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

“仓廩实，天下安。”粮食安全是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其提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粮食多一点少一点是战术问题，粮食安全是战略问题。”他指出：“无论社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14亿多人口的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始终是头等大事。”农业保的是生命安全、生存安全，是极端重要的国家安全，只有农

业强起来，粮食安全有完全保障，我们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才有充足底气和战略主动。

“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当前，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与此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影响冲击着全球粮食供应链的稳定。面对时代的机遇与挑战，为掌握先机主动，必须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夯实粮食安全“压舱石”，为中国式现代化有序发展打牢基础保驾护航。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立足长远，内容丰富深刻，为我国不断推进粮食安全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在这一科学理念指导下，我国坚持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粮食储备与应急体系，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

科学阐释自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粮食生产连续创下历史新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总体而言，粮食紧平衡的局面没有改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这篇重要文献从底线思维、大历史观、发展理念的三重交织视域，科学阐释了以我为主、自主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习近平总书记通过分析国内外两方面的情况强调了坚守粮食安全、牢牢捧住中国饭碗的重要性。从国内来看，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粮食需求量巨大。能否满足民众的粮食需求是决定人心安定与否、国家安稳与否的大前提。从国际来看，不仅进入国际市场的粮食贸易量无法满足我国的需求，

而且一旦吃饭仰仗他国，则势必威胁国家的独立自主。因此必须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坚持底线思维，在粮食问题上不犯颠覆性错误。

中国自古以来是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围绕老百姓的吃饭问题，曾搅动无数王朝的兴衰更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这些历史悲剧决不能重演”。以史为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记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永远绷紧保障粮食安全的这根弦。

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我国粮食发展所取得的长足进步的同时，指出不能满足于现有成绩，要看到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推进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趋势。因此着眼中国的长远发展，为实现粮食的供需平衡，必须将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科学指引

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将粮食安全战略总结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二十字方针，并就如何解决粮食问题的具体工作作出重要部署，为我国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引。

端牢中国饭碗，实行“两保”。粮食安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关乎国家稳定与发展的政治红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从端牢中国饭碗的前提出发，明确粮食安全的工作重点，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首先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即保谷物、保口粮，掌握粮食命脉。

守好耕地红线，发展民族种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种业是保障粮食安全的源头。要做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一方面要对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严防死守，量与质并重，注重保护与建设高标准农田；另一方面要借助科技培

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良种，真正让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调动与保护好“两个积极性”。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与主产区的抓粮积极性是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为此，既需要发挥市场定价机制，也要加强政府支持保护力度，不断调整优化农业补贴政策，使得多产粮食者得实惠、有发展。

居安思危，做好粮食储备调节。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自古以来就有设立粮仓的传统，在稳市、备荒、恤农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应重视粮食储备管理工作，建设清廉粮库。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高效利用社会仓储设施进行储粮，在保护粮食安全方面实现政府社会的协同用力。

中央与地方协作，共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中央和地方要共同负责。中央承担首要责任，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科技、搭建维护公共平台、转移支付等方面加强支持力度。各级地方也应在粮食生产、储备、流通、保护耕地等方面增强投入，坚持“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落实产销平衡区与主销区的粮食生产责任。

善于运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拥有庞大的粮食市场，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应积极稳健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国外农业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考虑经济、技术乃至政治上的风险，对开发、生产、利用与进口进行详细研究，建立健全机制，推动农业走出去，打造属于中国的国际大粮商。

在涉粮全领域削减浪费，弘扬节约粮食的社会风尚。作为拥有数千年农耕文明的农业大国，珍惜粮食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不过，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铺张浪费的不良风气也有所滋生。要在全社会敲响珍惜粮食的警钟，弘扬良好风尚，在粮食生产、流通、加工、消费的全领域全环节解决浪费问题。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当解放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曾担任日本文部省派遣中国日语教师、国民党阎锡山部新闻处翻译的平部朝淳对比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胜败得失，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军官的腐化堕落”。平部被共产党军队俘虏后，他看到：共产党军队士气高昂、军纪严明、处处关心群众生活，自己“从来没见过这样好的风气”。他好奇这样的风气怎样才能形成，共产党的干部告诉他一个非常朴素的答案：“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此时，正在中国南方休整的平部所在的第三十八军部队，“突然接到了行动命令”。平部随部队改编后，准备入朝参战。为了“使部队在朝鲜具体地实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部队开展了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教育。平部记得，政委讲话要求：“我军为支援朝鲜兄弟，为保卫祖国，要去朝鲜与美帝国主义军队作战。因此，要比过去更加严格地遵守军纪，必须使朝鲜兄弟信赖我们。”

这些与解放军、志愿军并肩战斗的日籍战士都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纪律严明，始终如一”。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纪律在军内军外贯彻执行，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一支人民所信赖的军队，在军队内部严格指挥命令，在官兵之间建立民主关系”。



一个多世纪前，心怀远大理想的青年毛泽东，面对中国封建王朝的衰落与西方文明持续而强烈的冲击，前瞻性地提出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不仅纠正了五四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对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而且还为他最终发现“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道路提供了基础。从《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来看，他对中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思考具有丰富的内涵。

首先，在为学之道上，提倡中西交融。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腐朽落后促使许多心怀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探索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的道路。在他们眼中，西方的富强不只由于自然科学技术的先进，还在于社会制度与人文关系的开明。因而，那一时期中国的知识文化界对于西方文明总体持推崇态度。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更是将西方政治学术思想的传播推向高潮。

1910年，毛泽东来到湘乡的东山学校求学，第一次接受了“新法教育”。在读到梁启超的《新民说》时，深受感染。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列举的“新民”所具备的诸多特质大多来自西方，并认为我们国家的道德虽然发展很早，但仅“偏于私德，而公德阙如”。不过，梁启超也同时意识到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认为对西方世界不必一味倾心。他在《论道德之大原》中强调：“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有时，何旧非新”，意在呼吁传统道德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受当时一些新说的影响，毛泽东1912年来到了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19世纪西方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著作，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卢梭的《民约论》等。在1915年《致湘生信》中，毛泽东向友人推荐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治学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待中西方学问的态度，即双方各有优长，应当平等相待：“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在深入了解了很西方文化思想后，毛泽东更加赞叹中华文明的广博。他在《致萧子升信》中说：“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万万亿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

其次，在对待西方文明的冲击时始终保持不偏不倚。青年毛泽东提倡治学要中西交融的观点受到了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在那个弘扬西学的时代，留过学的杨昌济对待西学的态度一直是中立与辩证的。他认为“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他也非常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藏的丰厚宝藏，主张中西文明应该“合一炉而治之”。

在老师的影响下，毛泽东不仅对待学问严谨与客观，而且对中西文明的看法也更具兼收并蓄的包容性。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指出：“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毛泽东更是在强调对中西文明辩证对待的基础上提出：“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在此批注中，毛泽东还对中西文明思想中的相通之处进行对比，写有“吾国先儒之说亦然”“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等。这些批注均反映了毛泽东学贯中西的视野。

那一时期，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针对东西文化、文明差异展开了大论战。如陈独秀认为，西方文化已经进入了“近代文明”时期，而中国文化还停留于“古代文明”时期。在《宪法与孔教》中，陈独秀强调了中国传统礼教与西方先进文明不能相融，必须要有彻底变革的决心与勇气，“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胡适等人主张全盘西化，“再造文明”。而以杜亚泉、章士钊为代表的东方派则坚持东西文明的差异并不代表着先进与落后之分，对于传统文化不能一味批判而是要继承发展。这场论战在

青年毛泽东『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

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也为更多人了解东西文明各自的优劣提供了基础。毛泽东对杜、章二人仅用儒家思想拯救世界的

主张提出反对意见，同时并不完全认同西方文明的所谓先进性。最后，在实践上寻求愿东西方都好的世界主义道路。毛泽东认为，中西两大文明都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古代文明有压抑和束缚人性自由的缺点，也有倡导“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人格与“世界大同”的至善理想。若能人人如此，则能共同跻身于圣域之中。“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西方文明有倡导自由、法治等价值的长处，也有霸权与掠夺思想的弊端。这种强权思想愈演愈烈，不仅使得国与国之间自相残杀，还会将人类引上绝路，为整个世界带来危机。

故而，毛泽东提倡要汇中西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取精用宏，根茂实盛”。要“搜罗万有，以博其心胸”，将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加以去粗取精，“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1919年10月，《北京大学月刊》刊载了毛泽东从长沙寄来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他在文中提出要将“东西文明会合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将之与教育问题、女子问题、孔子问题等视为还未得到解决，以致影响现代人生之进步的问题。

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其对中西文明的探索转移到实践上来。他认识到，不管是哪种文明，要想在中国土地上发挥作用，都需要加以实地调查研究。在向李大钊等人请教并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的著作之后，他慢慢寻找到了一个能够融通中西文明，并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的观点。在致信给张国基时，他创设性地提出了一种“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的世界主义。这种世界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极力倡导的社会主义。基于其对西方文明深刻的认识，他还同时强调了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都不能达成建设共产主义的目的。只有列宁的“激烈的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可以看到，毛泽东最终确定了马列主义作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指南。这一切的发生并非偶然，也是对东西文明会合问题思考后的必然产物。



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读〔日〕古川万太郎《冰冻大地之歌》

□ 路 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支持下，蓄谋发动全面内战，并把抢占东北地区作为重要战略计划。为打破国民党战略企图，在“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抽调八路军、新四军和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建立和发展武装，以积极防御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当时，有居留东北的日本侨民、日军战俘加入了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日籍战士，他们跟随部队转战东北、华北、中南，有的还参加了抗美援朝。

1984年，日本记者古川万太郎将采访这些日籍战士的内容整理成书，出版了《冰冻大地之歌》。书中透过日籍战士的视角，展现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火、不怕牺牲奉献、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历程，为我们学习党史军史、深刻理解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留下了珍贵资料。

“为了人民，和人民一起战斗”

岛田正和和岸本正臣都是日本政府组织的满蒙青少年开拓团成员。1945年从哈尔滨应征入伍才到抚顺，就传来日本战败的消息。1946年初春，共产党部队到达哈尔滨。岛田和岸本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三十八军）第一师第二团担架队。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经历了一个“与国民党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东北民主联军与敌人展开了历时三个半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此时的东北，千里冰封，岛田和岸本体验了彻骨的寒冷，“白天气温

在零下三十度以下，夜间达零下四十四五度，松花江及其他河流全部冻冰”。岛田看到“部队就在冰上进攻、撤退和开展游击战”，而用的武器主要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机枪和三八式步枪，平均两三人用一支”。岸本向一位东北民主联军的干部问道：“靠这样的军队能战胜国民党军队吗？”那位干部告诉他：“武器的优劣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国民党军看起来一时处于优势，但他们不懂战争的目的，所以无法维持士气。而我们有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受压迫的群众报仇雪恨，建立工人和农民的社会。我们是为了人民，和人民一起战斗。”

除此之外，岛田和岸本还看到“解放军军纪严明。他们不仅不伤害农民，而且注意不给农民添麻烦。在老百姓家住宿不仅付款，而且还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收拾整齐。行军中，干部经常教育士兵：‘没有农民的支援，我们就不能打胜仗。一定要尊重农民。’所以，从没见过官兵走路踏坏庄稼的事。”

“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

1941年加入日本关东军的浅野芳南，原在位于黑龙江北安的日军医院担任卫生军曹。苏联对日宣战后，浅野被俘，被移交共产党部队并在医院工作。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解放军集中主力70万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发《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浅野所在的医院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

军第三十九军，入关作战。

在行军队伍中，浅野眼看背着背包的解放军战士健步如飞，“一天行军四十公里”，不禁思绪万千。他想到：过去关东军的官兵们一提到八路军，总认为这个军队装备落后。现在看来，这个军队与有着现代装备的日军比较，其装备虽然破旧，但是日本却不能战胜他们。途中，浅野还看到很多他所谓的“怪事”：“行军中几乎看不到运送粮粮和其他补给物资的车辆，但见农民打扮的人们用扁担挑着弹药和粮食行进……做饭时，有当地农民帮忙。”

浅野所在的部队自山海关，经昌黎向唐山到达天津郊区。1949年1月，天津解放。浅野原本希望“能到早有耳闻的大天津去逛逛”，但部队绕过天津市继续南下。浅野很奇怪部队为什么不进入市区，后来才知道，解放军“要执行军队的城市政策。因当时大城市深受反共宣传的影响，为不使市民陷入不必要的紧张，为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战争结束后尽量控制进城部队”。

浅野随部队沿大运河经沧州南下，从山东渡过黄河，经河南至湖北汉口，登船沿长江至江西九江，再南下广州。这条行军路线，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浅野进入这片中国革命的“摇篮”时，“农民们呼喊着重来了。他们端着大碗的热水，向赶路的每一个士兵招手，请大家喝水。许多农民成群结队地赶来，简直就像过节一样。他们高兴地欢迎着行进中的士兵，高喊着‘我们的队伍回来了’，像迎接亲人那样欢迎部队的到来”。这让浅野“终生难忘”，也感叹：人民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